

涵泳红楼意味长

曾经,有十本名著被网友称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在第一位的便是《红楼梦》。我认为,其实这不是《红楼梦》的错,这恰恰证明了《红楼梦》的深不可测和无与伦比。

我是1993年读大学时买了一本岳麓书社出版的《红楼梦》,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扉页上我当年题写的一副对联“淡世薄财,看窗外几片黄叶;披肝沥胆,著案前一部红楼”,是写给呕心沥血的曹雪芹先生的。虽然写在这本书纸已经发黄发脆了,但我依然视若珍宝。

说实话,当年在高中读书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看文学名著。作为农家子弟,我那时候一门心思就想着把考试所要学的东西努力学好,争取跳出“农”门,所以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四大名著我一本都没看过。上大学了,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因学业需要,所以我读起了《红楼梦》。另一方面,当然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兴趣所使。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钟情写作。不读《红楼梦》,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当时《红楼梦》一买到手,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花了一个月零碎的时间将它读完的。一遍下来,我觉得自己只是囫圇吞枣,未解其中味,且《红楼梦》中的人物众多,读一遍根本理不清头绪。但因为太多书等着我去读,也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了。

促使我第二次拿起《红楼梦》的动因,那是走上工作岗位谈恋爱时受到的“刺激”。我第一份工作是老家乡下任教,恋人在乡卫生院工作,她是个“红迷”,对《红楼梦》内容了如指掌。她说自小就读《红楼梦》,把一部厚厚的《红楼梦》读得滚瓜烂熟。这让我感到惊奇。她有时候跟我交流,问到《红楼梦》中的某个细节,我如坠云雾。这让恋人十分恼怒,说你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连《红楼梦》都不熟悉。我于是又重新捧起《红楼梦》,认真地读了起来。真的是“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啊,再次读《红楼梦》,我才渐渐摸清了书中纷繁复杂的情节的门路。我想,《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也许就在于它会让你感觉到常读常新。它不是那一见到底的溪流,而是深邃浩瀚的大海。每一次读它,你都会有全新的收获与感悟。“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就是《红楼梦》对世人的影响。

后来到常州工作,我成了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会员,我发现“常州三杰”都对《红楼梦》感兴趣。瞿秋白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写有《多余的话》,里面就提到:“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一个革命

家,就义之前都不忘《红楼梦》,这种深情让人感动。张太雷在他的《家书》中对妻子说:“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多看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劝妻子多看《红楼梦》,张太雷肯定是自己读了之后有感触有收获,所以才推荐给自己心爱的人的。我看过恽代英日记,他在日记中就清楚地记着某天读《红楼梦》某章的话,连续读了二三十天,并且还对所读的内容有简短的评论。为此,我曾写过《恽代英读〈红楼梦〉》一文,对这位革命先烈的读书活动进行了总结。

我上大学时读的那本《红楼梦》,因为时间太久了,纸张憔悴无光,如风烛之年的老人,同时显得有一点脏。后来,我又买了两本《红楼梦》,一本给儿子看,一本我和爱人共阅。《红楼梦》毕竟太厚了,沉甸甸的,捧在手上时间一长,便感觉手发酸。于是,我想出了个办法,将我家里最早的那本《红楼梦》进行拆分,分成五六小册,这样读起来方便。我不是收藏家,我想,对《红楼梦》的喜爱,就是要持之以恒地进行阅读。我每次出差都带着拆分后的一册,有空就看几页。古人作诗有“三上”(枕上、马上、厕上)之说,我看《红楼梦》也是充分利用点滴时间的。

《红楼梦》读多了,我写文章时都感觉有了底气。远的不说,说一件最近的事吧。2023年国庆节,我儿子结婚,要作一副嵌名婚联,将儿子和儿媳的名字都嵌在对联中,这样更有喜气。为作这副婚联,我也是绞尽脑汁。刚开始时,婚联中有“蕙兰”一词,我刚开始时,婚联中有“蕙兰”一词,我一一想,“蕙”音不佳。《红楼梦》中有这样一节,“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丫头便说:叫蕙香。宝玉便问:是谁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一想到这里,我觉得“蕙”字应该换成其他的字为好。这就是读《红楼梦》给我的启发。文章《作了一副嵌名婚联》发表在2023年9月28日的《中国新闻网》上,文章中就引用了贾宝玉的那番话。编辑在微信上说我的推敲功夫了得,其实这都是拜《红楼梦》所赐啊。

像《红楼梦》这样的书,是属于一时读不懂的书。金克木先生曾写道:“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但如果想进入一种文化精神的内部,洞悉其基本结构和质地,就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多读一些读不懂的书,考验的是我们的耐心与毅力。

一本红楼卅载情,不离不弃读至今。岁月如流,痴情不改,我还会继续读它,直到永远……



图①、图②戴博元在工作图中 图③戴博元(左四)参加《张太雷年谱》编写工作会议



南大街的新街巷老宅,一间不大的住房内朝南靠墙摆放着一顶木质书柜。柜里分门别类、满满当地收藏着父亲一柜子的书。房间里的电视柜、床下也都堆满了父亲的书籍。

透过书柜的玻璃移门,能看到从古至今的辞海、辞源、词典、字典等工具书,《史记》《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历史书,苏东坡、黄仲则、恽南田等文豪大家的文集及父亲喜爱的文史掌故、戏曲书画、传记演义等。还有父亲的一些专著及他参与撰写的著作,如《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中国戏曲志·江苏分卷》《江南胜迹》《江苏省志·文物志》《恽南田年谱》《恽南田诗选》《张太雷年谱》《常州文史杂谈》《常州文物古迹》《天宁寺》等。此外,还有魏绍昌、郑逸梅、吕翼仁、黄葆树等好友赠送的书。

父亲一有空隙,便会打开书柜,坐在书桌前静静地捧起一本书,娴熟地翻着目录,仔细地查阅着字里行间。有时边看边记录着什么,看完了就会放下书本沉思,过一会儿又埋头开始他的写作。父亲看书写作时专注的神情与他清瘦的身形,让人至今难以忘记。年幼的我们,总是想不明白为何父亲有那么多写不完的书和写不完的文章。

记得原文办主任潘茂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你父亲看的古书多,肚子里的学问不得了,你要好好跟他学。”父亲一生唯爱书,即使在那砸烂一切、无书可读的“文革”年代,他的床头也堆满了如鲁迅杂文小说、范文澜《中国通史》及《史记》等不在红卫兵“破四旧”之列的书。书籍带给他广博的知识和无穷的乐趣,助他渡过了逆境,促使他在文物、文史、戏曲研究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从1979年起,父亲先后任市地名委员会与市文管办顾问。浩劫后的常

州文化界百废待兴,当时,地名编纂与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是他们的重点工作,父亲生前却很少跟我们谈起他的工作,因此我们也不知他有什么成绩。只知道他每次疲惫不堪、风尘仆仆地从外面一回来,就累得斜躺在床上,那一定是又去了很远的地方寻访什么古迹遗迹或乡贤耆老。记得有一次,他与常来家中的上海好友黄葆树老先生(黄仲则六世孙)满脸晒得发红、汗流浹背地一起从外面回来,边走边兴奋地谈论着“永宁庵”。事后,从父亲的《青山何处埋诗魂》一文中才知道,经过多年的文献资料研究及坚持不懈的一次次下乡寻访,他们终于在现址北环小学附近(当年还是一片菜地)找到了清代大诗人黄仲则的墓葬遗址。时值1983年6月6日,常州纪念诗人黄仲则逝世200周年。兴奋与感慨之情,父亲在文中展露无遗:“此时始觉身疲腹饥,当我们踏上归途时,内心却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由此可知,他的许多诸如《藤花旧馆变迁考》《南田常州遗迹寻梦》《张太雷家世和他的童年》《盛宣怀家世考》《李伯元家世考》等一系列作品的资料搜集与寻访考证,都是备受艰辛,很不容易的。

父亲年轻时得过肺气肿,年老后身体更是十分虚弱,稍一劳累便会发烧,经常需去医院挂点滴。我们最怕的就是晚上接到母亲焦急的电话说父亲病了,于是全家出动送父亲去医院急诊。父亲几乎每次出差回来必生病,尽管我们一再埋怨父亲晚年不要太劳累,减少外出,但年近古稀的他,为了文博工作依然故我。直至父亲仙逝后,从他的日记及文章中我们才知晓:1983年赴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查考到了苏东坡任职常州团练副使的证据;1984年冬,冒着大雪赴上海请刘海粟大师为《常州市地名录》题词;1985年为筹建黄仲则纪念馆与黄葆树一起在上海征集名人书画;1989年赴上海向收藏家王春渠后裔王瑞征集文

物,后又去送捐赠证书;1991年秋,赴天津参加常州与京广汉《张太雷年谱》分写作者研讨会;1994年再赴上海参加吕思勉先生之女吕翼仁先生追悼会等。

文化界的人士都认为父亲的文章资料性强且有文采。父亲著述严谨认真,他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发掘,不会简单照搬照抄前人已有的论述与资料,即使必要的引用,也会注明出处,充分尊重前人的著作权。看似一篇几百千字的文章,他都要尽可能地花费时间来寻找直接当事人、知情者,考证历史遗迹、文献记载或家谱,已有论著等相关资料,在资料充足可靠的基础上动笔。如他的《蒋君稼艺术摭闻》《恽南田年谱》(陆小曼的一生)等文章的后面都详细注有参考资料出处及原著者姓名;又如《贞和堂三百年沧桑史》《南田东园今何在》《戏剧评论家张肖伦》等文章,都是一一求证过如唐荆川后裔唐玉虬、恽家花园园主恽彦琦的曾孙恽慰甘及生父恽宝惠、张肖伦解放前上海交通银行的多位同事顾隆高等先生,结合他们的回忆和提供的资料,并在考证了大量当年报刊文献记载后撰写的,而恽宝惠、蒋君稼、张肖伦等前辈本都是父亲过从甚密、交往多年的师友;再如《歌台缤纷录》中众多人物与事件,几乎都是经函询求证,并咨询资深前辈戏剧评论家、好友张古愚先生后写就的。其中有高龄艺术,如常州籍著名电影演员徐高琴等在父亲函询后不久就逝世,可见这些资料来之不易。张太雷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丁则勤教授在1992年9月10日给王玮的信中亦是这样评价父亲的:“希望博元同志在百忙之中给一些指点,他的考证功夫很深,治学严谨,使在下十分倾心,望您代我向戴老师多多问候致敬。”

1979年父亲受邀任常州地名委员会顾问,1984年任常州市文管会办公室顾问,几十年来为家乡文史事业呕心沥血,默默耕耘,奉献一生。他最突出的成

就是参与了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史辞书的编写,如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文化部主编的《中国戏曲志·江苏分卷》及四省市《江南胜迹》等的编写,许多研究成果被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及日本《清末小说》等国内外权威机构、权威刊物采用和转载;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常州文史杂谈》,曾作为江苏文史资料第111辑(附录);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常州文史、地名、掌故方面的调查、访问、收集、整理、考证,对地方文史与文物古迹了如指掌,人称“文史通”,他参与并完成了对常州地区“文革”极“左”地名全面拨乱反正的我市第一部《常州市地名录》的编纂;上世纪90年代,他为常州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要领导及国家专家组委员郑燮、罗哲文等大师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正如中国当代文物建筑“兰亭”叙述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丹青先生所述:“在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考察活动中,博元先生总是如数家珍,吾辈同道之友每次均受益匪浅。”“先生所涉之典,无不引经据考,备溯渊源,珠玑荟萃,琳琅展列。”“文而有质,质而不散,博而不繁。可见先生探究之博,勤学之殷。”

父亲一生生活节俭,视书为宝,常常不惜用微薄的收入去购置心仪之书。他为人低调,和气和善,富有修养,不会攀附权贵,不会营私牟利。他虽话不多,但却默默地以自身行为和品行教育着儿女,用书香和风影响着后辈。父亲的书柜装满了他的人生和世界。书是父亲一生的热爱和积累,是他用笔耕耘人生的文化财富,也造就了他的一生奉献和不朽成就。书是父亲一生的缘。

父亲戴博元离开我们已整整九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往事,却时常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年8月20日是父亲百年诞辰,谨撰此文以作纪念。

城市地标 / 唐柏荣

记忆中的东城门及东水关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镇守常州的汤和将在原有的内子城、外子城和罗城的基础上又构筑了常州的新城。新城城墙在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至同治(公元1864年)年间,曾多次修整。至清末民初,城墙毁塌多处,而至民国末年更甚。

这里,我说的是儿时熟悉的明城墙的东城门及东水关。

东城门(即通吴门)门洞位置大约在现在的红梅路与延陵路交叉口偏西北处,城墙在红梅路与红梅南路西侧几米,接近平行或重合。

东城门及东水关是我儿时常玩的地方。我曾跟着大孩子们,趁守城人不注意时,偷偷到城墙上玩过几回。上城墙往北是一片荒草和一些灌木,到罗汉路附近时,城墙多处坍塌,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去,且四周荒凉,少有人迹。我们小孩子是不敢单独前往的。站在城墙上往东城外看,护城河对岸是天宁寺后的一片树林和远处的农田,树林中还散落着一些和尚坐化的“荷花缸”。在城墙上向南去,是由前河通过城墙而建的水关,在两段城墙中间,横架着两根粗大的方木梁,起吊水关木栅栏的两台木制绞盘机就安装在方木梁上。水关控制着航行在前河中进出城内外船只,早开夜闭。每天水关木栅栏的开启和关闭由两名警察操作。水关上的楼屋已毁,我们只敢远远地看看,不敢走近。

清末,我的先祖曾在水关南端的瓮城里置了三分多地种些菜。拆城墙前,我的小腿老奶奶(光绪二年出生)常常带着我们兄弟出城,走吊桥,到天宁寺对岸,过会龙桥,跨小溪,迈土坎,走很长的路到东城脚菜地里劳作。但更多的是带着我们去近路,过元丰桥,从纤道上穿过水关,上岸不远即到菜地。当然,大人是去劳作的,而我们则是去玩要的,捉蚂蚱、摸鱼虾之类。

1949年4月,常州解放,在东城门门洞口,我们兄弟挤在人群里和大人一起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入城的盛况。

由于时代发展,城墙的御敌功能逐渐丧失,甚至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瓶颈。常州的明城墙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拆除,我目睹了平时玩耍的场——城门洞、城墙、水关等被拆除的情景。

1952年城墙完全拆除后,在水关的原址上建了一座简陋的木板桥,以方便人们通行。当时人们称其为“水关桥”或“东水关桥”,这是在古老的明城墙水关遗址上诞生的最年轻的水关桥。桥两端的木栅栏是原城墙水关的建筑,水关桥下可以看到原来供纤夫拉纤行走的纤道。刚面世的水关桥与西侧百余米的千年古元丰桥共同担负起了为附近居民服务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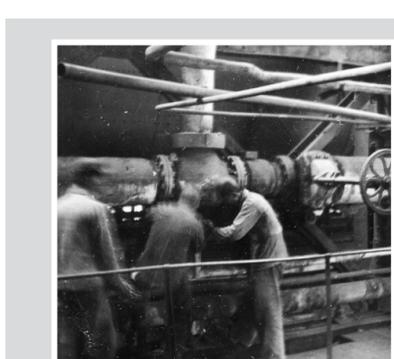
水关桥的建成,为东门城内与城郊的通行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大炼钢铁的50年代,常州各行各业“小高炉”都集中在桃园地,炼钢用的各种矿石、原材料、燃料等物资和人员除通过东太平桥外,水关桥也成为运输的重要通道。

年轻的水关桥诞生后,与元丰桥并存了十年。上世纪60年代初,元丰桥意外倒塌,水关桥就成了唯一的交通要道。

元丰桥建于唐代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已有1300多年。元丰桥倒塌后,有关部门顺应民意,把原城墙遗址上的水关桥正式定名为元丰桥。从此,元丰桥又重新回到常州人民的生活中。

此后几经修整加固,并于1969年将原石台木面桥改建为长12.1米、宽6.7米的板梁水泥桥。跨入新世纪后,因旧城改造,又将元丰桥向东移了几十米,以更新的姿态、更具现代气息的面貌发挥交通要道的功能。

戚电工人有力量



□李慧 秋冰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咱们工人有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写照,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歌曲的诞生地位于中国华电佳木斯热电厂。在同一时期,与黑土地遥相呼应的江南水乡,斗志昂扬的戚电工人也同样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斗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渡江战役。大量国民党溃军仓皇逃窜,不断从戚墅堰电厂路过,子弹“嗖嗖”地从发电机房顶飞过,甚至从值



班人员的身旁掠过。但坚守在岗位上的工人们镇定自若,全厂312名员工无一人离开工厂,英勇地保护着发电设备。无锡、常州、丹阳等城市坚持未断电,直到4月23日常州解放。

4月24日,常州解放第二天,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派飞机频繁在电厂上空盘旋扫射,妄图破坏电厂生产。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进驻电厂,加入防空袭战斗。

就在10月29日上午,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喜悦之中时,一架国民党C-47运输机在戚墅堰上空散发反动传单,被解放军高炮击中坠毁,8名随机人员全部被俘。当天中午,又一架



敌机被厂内人员用机枪和高射炮击中。11点30分左右,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队派出9架重型轰炸机到戚墅堰上空展开疯狂报复,轮番对电厂狂轰滥炸。电厂中弹36枚,厂内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部分厂房燃起熊熊大火。

遭受轰炸时,为了坚持发电,电气、汽机、锅炉的运行值班工人临危不惧、坚守岗位,直到发电机被炸,才进入防空洞。这次轰炸造成8名戚电员工伤亡和两名驻军战士牺牲,全厂50%的生产、生活用房被毁,供电设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无锡、常州、丹阳等城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大轰炸的第二天起,常州接连下了七

八天大雨,被炸的厂房内,不少发电设备裸露在外,随时都有遭雨淋而受损坏的危险。厂里遮雨油布不够,工人们主动拿出家里的雨衣给设备上盖,并冒雨抢修设备;住在戚电厂附近的员工,自家房屋中弹被毁,但他们舍小家顾大家,赶到厂里参加抢修;线路工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扶起一个又一个被炸塌的铁塔,冒雨登塔架设线路;起重工孙为公不顾个人安危,带病爬上60米高的烟囱,进行抢修……抢修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常州各医院组建了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抢险队,为被炸伤员包扎、治疗;常州大成二厂、三厂组织消防队,赶赴戚电厂参加灭火;常州协盛、协丰、同庆、大同、九丰、协源、义利、志恒盛等8厂联合组成了76人抢险队参加抢修,各方协力,夜以继日,在被轰炸后的第五天,戚电厂终于又能发电。仅用不到半个月时间,全厂发电能力基本恢复。

反轰炸斗争的胜利,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和支援正在南下的解放战争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党和人民政府对戚墅堰电厂工人给予了高度赞扬。苏南行政公署的“嘉奖令”这样写道:戚墅堰第一发电厂遭美制蒋机轰炸,受到严重的破坏,该厂全体员工高度发扬了工人阶级勇敢勤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抢修,尽速恢复生产,对苏南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贡献甚大,特予嘉奖。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在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电业会议,会上授予戚墅堰发电厂“群策群力,英勇护厂”锦旗一面。

